

阳明文化

编者按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，其跨文化传播与影响，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维度。阳明心学作为中国儒学发展的高峰之一，不仅深刻影响了明清以来的中国思想与实践，更漂洋过海，成为东亚文明对话中一股活跃的思想力量。朝鲜半岛是阳明心学东传的关键一环。自16世纪中叶起，阳明心学随使臣往来与典籍流通进入朝鲜王朝，经历了从接触、排斥、论辩到逐步本土化的曲折过程。本期专栏聚焦“阳明心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转化”，组织专家学者深入探讨，以期增进读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海外影响的理解，为今天推动文明互鉴提供历史的观照与启迪。



朝鲜儒学泰斗李滉教育儒生的韩国安东陶山书院

阳明心学在朝鲜半岛的早期本土化

方东华

阳明心学以“心即理”“致良知”“知行合一”为核心，突破了朱子学的“理在气先”框架，在十六世纪中后期随使臣往来与典籍交流东传至朝鲜半岛。面对当时已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朱子学正统，这一“异质”思想经历了从接触、排斥、激烈论辩直至创造性调适的扎根过程，呈现“重实践伦理、轻本体革命”的鲜明特征，这是一场跨文化思想对话与创造性转化。

传入与初遇：16世纪中后期的思想邂逅

阳明心学传入朝鲜的契机，源于16世纪明朝与朝鲜王朝密切的外交与典籍交流网络。1392年朝鲜王朝建立后，朱子学被确立为国家正统意识形态，“性理学”贯穿科举、教育与社会伦理。朝鲜长期通过“燕行”与明朝保持使臣往来，使臣兼具外交与典籍搜集、学术学习使命，心学便借这一官方渠道进入朝鲜知识精英视野。

王阳明（1472—1529）去世后不久，其核心典籍与思想便逐渐传入朝鲜。嘉靖年间（王阳明卒于嘉靖七年，公历1529年），《传习录》《阳明文集》等开始流传，16世纪中后期朝鲜使臣的“燕行录”中已出现相关记载与评论，如有记载提及“王阳明之学，近年盛行于中原”，此阶段传入的核心典籍包括《传习录》早期刻本等，通过使臣购置、明朝馈赠等方式进入朝鲜书院与精英圈层。心学初入朝鲜时影响有限，仅覆盖少数接触中原学术动态的上层精英。这与当时朝鲜的思想环境直接相关：朱子学经郑梦周、郑道传等阐释推广，已形成完整的“性理之学”体系，在“四端七情”等核心议题上框架固定。

郑齐斗的思想突围与朝鲜阳明学的确立

林甲换

十七世纪末的朝鲜思想界，如同一片被冰封的湖面——表面平整如镜，底下却暗流涌动；这片冰层就是正统朱子学的绝对权威，而那涌动的暗流，则是被压抑百年的阳明学脉。一位学者开始了孤独而决绝的破冰之旅，他就是郑齐斗（1649—1736），号霞谷，朝鲜阳明学的核心奠基人与确立者。

郑齐斗的艰难抉择

十七世纪末的朝鲜思想界，呈现出朱子学独尊的表面稳定，其根基之深已渗透至社会各个层面。自十六世纪王阳明学说通过使臣渠道传入朝鲜，便立即遭遇以李滉（退溪）为首的主流儒学的系统性批判。李滉撰《传习录辨》，对阳明学进行了系统的哲学批驳，并将其定性为背离正统的“异端邪说”。在朝鲜王朝的体制设计中，朱子学不仅作为科举取士的唯一标准，更是规范社会伦理秩序的根本准则和维护王朝稳定的意识形态基石，使得任何对朱子学的理论性质疑，极易被解读为对政治秩序本身的挑战，从而超越了纯粹的学术讨论范畴。因此，阳明学在朝鲜的传播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极其严峻的生存环境，长期处于被排斥和压制的境地。

郑齐斗出身两班贵族，其人生本应遵循研习朱子经典、通过科举、步入仕途的标准轨迹。然而，他在深入研读《传习录》等阳明学著作的过程中，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思想转变。他描述这种体验为“如暗室得灯，向之疑团，涣然冰释”，这表明阳明学为他解开了在

对朝鲜精英而言，朱子学不仅是学术思想，更是维系统治合法性与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，因此，与朱子学存在根本分歧的心学，最初多遭警惕与排斥。

这一阶段的“思想初遇”呈现“单向输入”特征。朝鲜学者对心学的理解基于有限典籍，缺乏与阳明后学的直接对话，对核心概念常有偏差，如将“心即理”等同于佛教心性论，指责其“混淆儒释”，这种误解与排斥为后续论辩埋下伏笔。

论辩与扎根：“四端七情论辩”中的思想调适

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初，心学传播进入“论辩与扎根”阶段，核心标志是围绕“四端七情”的论辩及郑齐斗（1649—1736）对心学的系统接受与创造性发展。相较于“浅层接触”的初遇阶段，此阶段的“深度碰撞”澄清了心学核心要义，也使其在与朱子学对话中完成初步本土化调适。

“四端七情论辩”是朝鲜朱子学内部的重要论争，却为心学介入提供了契机。论争核心是“四端”与“七情”是否同源，形成两大阵营：李滉（退溪）主张“四端发于理、七情发于气”的“主理说”；李珥（栗谷）提出“四端与七情皆发于气”的“主气说”。这场论争深化了朱子学“理气道器”关系的辨析，但暴露出的理论困境——如心与理气关系难以厘清，为心学传播提供了思想空间。心学“心即理”的主张恰好触及论争核心困境。朱子学理气二分的框架导致心性与情感关系的解释矛盾，而阳明“心即理也，天下又有心外之事、心外之理乎”的论断，将理内置于心，认为四端与七情皆是心的发用、良知的不同表现形式。这一全

新思路吸引了诸多在论争中困惑的朝鲜学者。

在此背景下，郑齐斗成为朝鲜阳明学奠基者。他出身儒学世家，早年接受系统朱子学教育，深刻体会“四端七情论辩”的困境。成年后研读《传习录》等典籍，逐步接受心学核心主张，构建起朝鲜阳明学理论体系“霞谷学”。其贡献不仅在于系统阐释心学要义，更在于将其与朝鲜思想语境结合，完成心学的初步本土化改造。郑齐斗对心学的“创造性转化”体现在三方面：其一，本体论上弱化“心即理”的革命性，调和心学与朱子学之理，提出“心者，理之舍也；理者，心之体也”的“心理合一”观点，既避免与正统冲突，又保留重视心性的核心特质；其二，工夫论上融合“致良知”与朝鲜朱子学修养传统，强调“致良知”的实践伦理意义，将其视为通过“省察克治”展现良知于日常伦理的具体过程；其三，社会伦理上结合“知行合一”与朝鲜士大夫伦理，凸显“致良知”更要“行良知”的实践品格。

“霞谷学”的构建标志着心学在朝鲜初步扎根。尽管仍被朱子学正统视为“异端”，但通过与主流思想的对话调适，心学核心思想成功融入朝鲜儒学传统，形成独特体系。郑齐斗的思想突破了朱子学僵化框架，为朝鲜儒学注入活力，奠定了朝鲜阳明学的传承脉络。

早期本土化特征：重实践伦理的思想取向

心学传入朝鲜后的早期本土化，是结合其思想环境与社会需求的“创造性转化”，呈现“重实践伦理、轻本体革命”的鲜明特征。这一特征既是与朱子学对话调适的

结果，也是朝鲜社会现实需求的体现。

首先，本体论层面呈与朱子学“谨慎对话”的姿态，弱化“心即理”的革命性。阳明心学“心即理”是对朱子学“理在气先”“理在心外”的根本否定，具有强烈革命色彩；而郑齐斗等朝鲜早期心学学者，在接受“心即理”的同时未否定理的客观性，提出“心理合一”的调和观点。这种选择并非妥协，而是在朱子学绝对正统的环境中，为心学争取生存与传播空间的现实考量。

其次，工夫论层面侧重“致良知”的实践伦理与心性修养，将核心议题从本体建构转向道德实践。阳明心学“致良知”兼具本体认知与工夫实践双重属性，而朝鲜早期心学学者更强调其道德实践意义，视之为解决社会伦理问题的途径。这与朝鲜当时的内忧外患局势密切相关——壬辰倭乱与后金（清）威胁叠加，内部官僚腐败、伦理失序，知识精英迫切需要强化道德修养、凝聚共识的思想理论。郑齐斗强调“致良知者，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”，将其与具体人伦关系结合，使心学从抽象理论转化为可操作的道德指南。

最后，思想传承层面形成“以实践为核心的”脉络，注重学者的道德人格与社会担当。阳明心学后学流派多元，侧重各异，而朝鲜早期阳明学传承始终围绕实践伦理，将心性修养与社会担当视为核心使命。郑齐斗所奠基的这一实践取向，在近代朴殷植、申采浩等学者处得到了新的继承与发展，借心学资源批判现实、推动社会变革，使朝鲜阳明学始终紧扣社会现实，避免流于抽象思辨，彰显本土化特色。

（作者为宁波市王阳明研究院副研究员）

功夫，形成简捷有力的实践法门。

从思想突围到学派确立

郑齐斗的理论锻造并非书斋里的独自沉吟，而是伴随着具体而微的传播实践与学派建设。他的“辟朱鸣王”之路，是一条将思想从个体化认转化为学派传承、从边缘暗流推向历史前台的漫长征途。

著书立说，奠定文本根基。郑齐斗深知，思想的存续需要坚实的文本载体。他将毕生所思所辩，凝练于《霞谷集》这部巨著之中。其中《存言》《辟荒录》等篇章，系统构筑了他的阳明学体系，堪称朝鲜阳明学的“原典”。这些著作以严谨的论证、渊博的引据，正面回应了所有主流批判，为后来的追随者提供了抵御攻击的理论盔甲与进攻突围的思想武器。

教育传承，播撒学派火种。他首先在家族内部讲授阳明学，其子郑文升、其孙郑始寿承其家学，形成了最早的代际传递链条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吸引了少数敢于冲破思想禁锢的士人，形成了最初的学术圈子。他的教诲注重“体认”与“践行”，常于日常生活间指点良知发用之机，而非拘泥于章句辩论。

思想辐射，滋养学术新流。郑齐斗的影响并未局限于狭义的阳明学派。他的思想与后来的实学大家李滉产生了共鸣。李滉的实学思想来源复杂，但其中注重实践、反对空谈的精神，以及对宇宙“生生”之意的强调，与郑齐斗的“生理”说及实践导向存在思想上的契合点，显示了郑齐斗思想突围的辐射效应。

（作者为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教授）

功夫，形成简捷有力的实践法门。

从思想突围到学派确立

郑齐斗的理论锻造并非书斋里的独自沉吟，而是伴随着具体而微的传播实践与学派建设。他的“辟朱鸣王”之路，是一条将思想从个体化认转化为学派传承、从边缘暗流推向历史前台的漫长征途。

著书立说，奠定文本根基。郑齐斗深知，思想的存续需要坚实的文本载体。他将毕生所思所辩，凝练于《霞谷集》这部巨著之中。其中《存言》《辟荒录》等篇章，系统构筑了他的阳明学体系，堪称朝鲜阳明学的“原典”。这些著作以严谨的论证、渊博的引据，正面回应了所有主流批判，为后来的追随者提供了抵御攻击的理论盔甲与进攻突围的思想武器。

教育传承，播撒学派火种。他首先在家族内部讲授阳明学，其子郑文升、其孙郑始寿承其家学，形成了最早的代际传递链条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吸引了少数敢于冲破思想禁锢的士人，形成了最初的学术圈子。他的教诲注重“体认”与“践行”，常于日常生活间指点良知发用之机，而非拘泥于章句辩论。

思想辐射，滋养学术新流。郑齐斗的影响并未局限于狭义的阳明学派。他的思想与后来的实学大家李滉产生了共鸣。李滉的实学思想来源复杂，但其中注重实践、反对空谈的精神，以及对宇宙“生生”之意的强调，与郑齐斗的“生理”说及实践导向存在思想上的契合点，显示了郑齐斗思想突围的辐射效应。

（作者为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教授）



阳明学与朝鲜朱子学的百年论辩及其思想史意义

方嘉文

十六世纪，朝鲜王朝的性理学（朱子学）在李滉（退溪）和李珥（栗谷）推动下臻于鼎盛之际，一股来自明朝的新思潮——阳明心学，随使臣与书籍东传。在奉朱子学为唯一正统的朝鲜儒林看来，阳明学所高扬的“心即理”“致良知”，无疑是对客观“天理”和严谨工夫与社会伦理秩序的颠覆性挑战。一场延绵数百年的思想交锋就此展开。这部“异端”的受历史，其意义远非一个学派的兴衰所能概括，更揭示了异质思想如何作为“他者”，刺激主流学说不断自我界定与深化，并在此过程中悄然塑造整个思想史的轨迹。

朝鲜朱子学对阳明学的核心批判

朝鲜儒者对阳明学的批判，集中在以下几个核心层面，构成了百年论辩的主轴。

对“心即理”的伦理恐慌：动摇客观秩序的“禅学”嫌疑。朝鲜性理学绝对信奉客观、超越的“天理”。李滉的“理贵气贱”“理动”说，将“理”置于主宰地位。阳明学“心即理”将道德源泉内植于心，被视为主客混淆、吞没理于心的危险学说。奇大升（高峰）在与李珥论辩中即指其“大概近似于禅”。在李滉后学看来，若人人各执其心为标准，必将导致“公是公非”混灭，社会规范失却客观依据，陷入主观混乱。

对“知行合一”的工夫论驳斥：架空“穷理”的“蹈空”之弊。朝鲜朱子学尤重“居敬穷理”工夫，视“格物穷理”为通过读书、观察逐步认知“天理”的渐进过程。阳明学“知行合一”及其“知行本体”论，认为真知必能行、行即是知，在批判者看来实为轻视乃至架空“穷理”工夫。朝鲜儒者认为阳明学将“知”等同于道德直觉，忽略学问积累，易流于“不学不虑”之虚空，恐使士人荒废经典、轻视事理，养成“虚谈狂妄”之风，难以培养经世致用之才。

对“四句教”的严厉道德谴责：瓦解性善论的基石。阳明学“四句教”（无善无恶心之体，有善有恶意之动，知善知恶是良知，为善去恶是格物。）在朝鲜激起最激烈义愤，尤以首句为甚。在笃信孟子性善论的朝鲜儒者眼中，心体“无善无恶”根本无法接受，直击儒家道德形而上学基础。他们斥此说类同告子“性无善无不善”，近于佛教“空寂”之论。朝鲜儒者坚信本体至善（理善、性善）是一切道德实践之终极保证，否定此点则工夫论失去根源与方向。

郑齐斗的调和与异端辩护

在高压之下，阳明学并未绝迹，而是以私相授受的方式流传。其集大成者郑齐斗（1649—1736）的独特贡献在于，身处朱子学话语体系中，试图调和两者，为阳明学进行“合法性辩护”，将潜流思想提升至体系化高度。

以“生理说”重构“心即理”：寻求与性理学的接榫。面对“心即理”被斥为“禅学”的指控，郑齐斗创造性提出“生理”说。他将“心之体”或“良知本体”阐释为一种活泼的“生理”。此“生理”既是天地万物

的普遍生命原理（与“天理”相通），又具体内在于人心（体现为“良知”）。“心即理”不再被理解为以主观否定客观，而是强调天理的呈现与实践必须通过内在的道德本心（生理）来实现，注重天理在主体生命中的内在性与能动性。

以“诚敬”统摄“致良知”：弥合工夫论的裂隙。针对忽视“穷理”的批评，郑齐斗着力将“致良知”工夫与朱子学重视的“诚敬”结合。他强调，“致良知”过程本身需要“诚敬”态度，而“诚敬”的内容就是“致良知”于事事物物。阳明学的“知行合一”并非反对学习，而是反对脱离道德实践的“口耳之学”；“致良知”本身包含了在具体事为中去体认、践履天理的要求，这与“格物穷理”的终极目标并非截然对立。

重新诠释“四句教”：剥离其佛老色彩。对于最敏感的“无善无恶心之体”，郑齐斗采取了本体论层面的诠释。他倾向于将“无善无恶”解释为心体作为纯粹至善的绝对状态，它超越经验层面的善恶对待。强调“良知即天理”，而天理是至善的，从而将阳明学的本体论重新锚定在儒家性善论的基础上，洗刷其“告子、禅学”的污名。

论辩的余波与思想史意义

这场持续数百年的论辩，其影响远非单纯的学派胜负所能涵盖。它深刻地塑造了朝鲜思想史的轨迹，这一过程在多个维度上得以显现。

朝鲜朱子学特质的固化。对阳明学的激烈批判，如同一面镜子，照见并强化了朝鲜朱子学自身的特质。为划清界限，主流儒学更加凸显“理”的客观绝对性、强调“敬”的严谨工夫、恪守“穷理”的学问路径、坚守“性善”的道德严格主义。这使得朝鲜朱子学（尤指退溪学派）呈现出比中国朱子学更强调“理”的本体性，更注重“敬畏”与“克治”工夫的倾向。正是在与“异端”的对抗性对话中，朝鲜朱子学的主体身份和独特风格得以进一步明确与巩固。

为实学思潮提供潜在养分。尽管实学思想家大多公开尊朱斥王，但阳明学潜流可能间接为朝鲜实学思潮提供了微妙的思想酵素。主要体现在两方面：其一，在精神气质上，阳明学对“知行合一”与“事上磨练”的强调，虽遭批判，但其反对空谈、注重行动中领悟的取向，与朴趾源、丁若镛等实学家批判“空理空谈”、倡导“利用厚生”的务实倾向，形成内在共鸣。其二，在思想权威层面，阳明学“学贵得之于心”所蕴含的对个体判断力的信赖，可能无形中松动了朱子学绝对权威的根基，为后世实学家敢于修正经注、接纳西学，营造了潜在的批判氛围。

民族启蒙思想家的再发现。至朝鲜王朝末期及日据时期，面对国家危亡，朴寅植、郑寅植等民族启蒙思想家开始重新挖掘阳明学。他们看中的，正是其中强调心力、鼓舞行动、自信自立的精神力量。朴寅植著《阳明学实记》，明确将阳明学视为挽救民族士气、激发爱国行动的思想武器。此时，阳明学不再主要是哲学论辩的对象，而被重构为一种行动哲学与心性革新的象征。

（作者单位：余姚市东海城市文化研究院）